

## 委员 笔记

## 曾在军旅

高洪波

30或者40年前，也许更早一些，没有产生这样的歌词：“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是呀，问得好，有啥不一样？

当兵的人和老百姓应该没有太多的不一样，那时候当兵光荣、当兵时髦、当兵还可以走南闯北。“骑马挎枪走天下，祖国处处是我家”，这是一句有名的歌词。当兵的人，当得自豪、骄傲、理直气壮，好男儿志在四方，大丈夫马革裹尸，一身绿军装，包裹住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心，甭问什么一样不一样，当兵的人，心理优势比谁都强。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当兵的人中出了一个伟大的小子兵雷锋，他让一个共和国沉思、致敬，无例外地向他垂首致敬。一个著名的诗人写出了一首时代的强音《雷锋之歌》，至今读起来还让人心潮澎湃。雷锋这个当兵的人当出了真正的“兵味儿”。

当兵的人，怎能不自豪！

继而是欧阳海、刘英俊、王杰、麦贤得……一批响当当硬邦邦的名字，焊接在“人民解放军”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上，使之具有了别国军队所不具备的素质，“人民军队”四个字，再添上三个后缀——“爱人民”，这就足够了，当兵的人，当的是人民的兵，来自人民，又还原于人民，是人民子弟兵。

这就是当兵的人所需要了解的除了绿军装之外的全部意义。我曾有过10年的军旅生涯。

17岁到27岁，地点在遥远的云南边疆。生命中有一段当兵的岁月，这就给你终生留下不褪的绿色。我当过炮手、无线电兵，还当过播音员、放映员、图书管理员，最高的官衔是新兵连指导员，实际职务是炮兵排长，我当兵时没有军衔，如果有的话，我应该是一名中尉。

中尉高洪波！多么奇妙的一种组合，可惜我的全部军旅生活被红领章所替代，还有一枚红五星，至今我珍藏着这帽徽与领章，以及刚刚入伍时发的一本微型的《毛主席语录》及《毛选》四卷，那是遥远的1969年初春的事。我收藏这几样“文物”不为别的，只为了它们曾经证实过我的青春，今天又意味着那一段历史。历史本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可我却能触动和抚摸它，这感觉本身很奇特，因此也能解释世界上所有的大收藏家的古怪行为。

我说过，我们那个时代当兵光荣，甚至很费劲，为什么费劲？因为我的视力不太好，右眼1.5，左眼却散光，很担心成为我参军体检的主要障碍，为此我用三天三夜的时间背诵视力表，结果终于达标。只因为大想当兵！

我当兵时没有想到当作家，因为作家那个时候大多名声不太好，军人是武人，与文人照理天生无缘，否则何以解释“秀才遇上的兵，有理说不清”这句民间俗语？

可见军人不属于文人的视野。

但生活就是这般古怪，军旅中又最造就文人，这几乎是自古至今的一条规律。远的不说，就我所在的军区，出过冯牧、徐怀中、白桦、公刘、苏策、彭荆风，也出过公浦、李康、李钧龙、郭明孝、张勤……这是军旅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是云南奇异的自然景观给予军旅文化人的特殊馈赠，既然我的老部队走出这么多的作家，他们的名字和著作唤起我的向往乃至崇敬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剩下的就是自己修炼，包括读书、练笔、观察、思考。军营是一本读不尽的大书，一页页翻过去，有时细读、有时粗观，因为其间有你自己生命的投入、青春的磨痕，军旅生活便显示出了格外的与众不同。

就这样我由一个当兵的人，转化为一个提笔的人。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这是一位伟人说过的，事实上我们的武人们从没轻视过文化的伟力，军长师长团长直至连排长，尊重文化使得我的老部队与众不同，我的成长源于这种支持。至今我记得我的师长——一位老八路，就曾反复念叨着一批文化人的名字，他是战斗英雄，他的事迹是这些战地记者、文化人所描述、进而登报成名的。所以师长尊重笔杆子，在喜欢打篮球的同时，他更喜欢秀才，如今老师长早已离开我们多年，在军营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叫《重温入党志愿书》，就以这位老师长为题，不过我设计的是让他去打靶，靶上的弹着点枪枪十环，是他最好的重温入党志愿书的记录，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与诗的升华，但绝对符合老师长的个性。

我于是从中享受到创作的愉悦。

真心地希望年轻的朋友们或者战友们能记住我的话，当兵的人，平凡也非凡；当兵的人，应该拥有双枪，一支是自动步枪，另一支是钢笔，当然现在已经是电脑了。古人推崇“文武双全”，只有当兵的人才能具有这种“双全”的条件，比如像我后来所在的一个又一个的杂志社、文化单位，谁也不敢自称“文武双全”，因为只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文人的团队。

文武双全，一个男人的成功目标，一个军人的理想标尺。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华夏

## 名家 名笔

## 两杯清茶

李春雷

系，从未参加过一次相关活动。

天气闷热，我打开电扇。电扇摇头晃脑，散乱地吹风。

但我们的话题，却集中，也热烈。他说看过我的一些散文作品，欣赏我的文字感觉，希望专心致志，进入文坛。

是啊，他当过重点中学语文老师

和校长，还是作家和评论家，更是一位热心的文学界领导人。他的办公室不足10平方米，却是作家们的乐园。众人和他挤坐一起，清茶一杯，话题成堆。业余作家散落各地，或居偏远乡村，或处喧闹工厂，他都会按图索骥，踩着泥泞，穿过风雨，登门寻访。1995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那一年，我十八岁》出版，他很快就在《河北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热情鼓励。

刚过11时，他起身告辞。

我真诚地表示已安排宴请，要敬他几杯。他笑一笑说，要宴请也应他买单，不过，君子之交淡如水，既然已经喝茶，就不喝酒了，而且，他从不饮酒。他走后，我发现，茶水也并没有饮几口。

两杯茶水，清澈澄明，依然端坐那里，静静相对，默默交流。

这之后，我与他的接触仍旧稀少。很快，他退休了，我也到外地写作。但在我心里，已把他奉为师尊。逢年过节，总要问候。

再几年，我得奖了，又得奖了，薄有虚名。但毕竟年轻啊，对自己的未来，并无规划。

他多次劝我，最好调到文联，从事专业，并直接向市领导推荐。我调入文联后，他又建议，要专门成立工作室。工作室成立后，为了给我创造更宽松的环境，他又数次致信市领导，并主动登门，当面陈情，大声疾呼。有些言辞，尖锐激烈，惹人

不快。这些言行，对于一位温和、清高、与世无争的退休老人，何其出格！但更难忘了的是，对于我，他总是真诚却又严正地劝诫，不要骄傲，不要满足，要走出邯郸，要超越自我，

要站在历史和文明的高度，进入知识分子写作，语重心长、苦口婆心。有一次，甚至瞪大眼睛，怒颜厉责：“春雷啊，你要清醒啊！”

我猛然惊醒，幡然悔悟。

的确，他历尽沧桑、学识渊博、不沾烟酒、淡泊名利，是一个真正的明白人和善良者，有圣贤之风、君子之质。

我，当然理解他的善心和苦心。

于是，我们的心更贴近了。我多次恳请登门拜访，可他总是回避。托词永远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要客气、不要麻烦、不要浪费、不要俗套。

一次，我执意宴请，他终于答应了。我立即买来不少礼品，备在车上。宴席上，他照旧只是品茶、聊天。饭后，我坚持送他回家。可到达后，他仍不上楼。我直言相告，这些用品仍有重量，需要搬运。他犹豫了一下，但态度不变，拒绝让步。为了避免尴尬，他只拿出一箱牛奶，提在手里，叹息着，慢慢地上楼了。

看着他清瘦却坚挺的背影，我默然无语。

老天作证，这是我平生送给他的唯一礼物，却没有送进家门。

我想，他虽年迈，但精神矍铄，来日方长吧。

去年4月底，我在北京，突然得到消息：高杨先生去世，鉴于疫情，丧事从简。

惊闻噩耗，五内俱焚。躬身向南，遥致哀心。

独处时、静夜里、睡梦中，总有一位儒雅博学的老人、一位亦师亦友的长者，悄然而至，微笑着看着我，严厉地瞪着我，却又热切地护佑着我。

看着高逝的天空，我常常想，如果世上犹存君子，他必定是一位；设若人间尚留良心，他绝对有一颗。可惜啊可悲，这位君子、这颗良心，远去了，远去了。

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清明临近，天人同祭。我不能不强烈地想起他，我的良师，我的恩师！

我似乎又看到了25年前的那两杯茶水，清澈澄明，像他的一双眼睛，看着我，看着我……

(作者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 诗词 鉴赏

## 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

(外一首)

胡宏伟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  
多少身影在逆行而上  
我是党员，让我来  
我要入党，让我上  
啊，不忘初心  
忠诚担当  
在每一双眼睛里  
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

在生死阻击的前方  
大爱真情撑起希望  
哪里呼唤，让我来  
哪里艰险，让我上  
啊，众志成城  
砥柱脊梁  
在飘扬的党旗下  
凝聚起不可战胜的力量

## 只要有爱

天不会塌  
腰不会塌  
再大的灾难袭来  
头也不会低下

山不会垮  
人不会垮  
只要有爱的阳光  
希望就会发芽

啊，不灭的是信念  
不断的是牵挂  
乌云终会散去  
春风吹来，又是遍野芳华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词作家)



## 庆阳的窑洞

杨维军

辛劳一生，最基本的愿望就是筑几孔窑洞，把结婚叫“入洞房”，有了窑娶了妻，才算成了家立了业。路遥、陈忠实、姚自昌等作家，都写过窑洞的故事。

这里的窑洞也孕育了中国革命，传承着红色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把它概括为“两点一存”，就是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后期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这里的一排排窑洞，见证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与成熟，曾经寄托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和力量。延安的窑洞无疑是最革命的，庆阳的窑洞也与中国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曾经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走向胜利的发源地和起始地。

华池县的南梁位于陕、甘两省交界的梢山中，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南梁是最初的陕甘边、后来的陕甘或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和“心脏”，是一块不能被遗忘、轻视的红色热土。20世纪20年代末，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南梁一带宣传马列主义，组建游击队，点燃了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烈火，擎起了工农武装的红色大旗。为把南梁建成巩固的南方。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小河沟四合台重建，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寨子湾恢复，同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标志着武装斗争的全面开展及根据地的基本形成。随着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关帝庙召开，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史称“南梁政府”，同时还选举成

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建设，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如果没有这块革命根据地，或者创建以后也像其他革命根据地一样丢失了，中国革命何去何从，将是一个未知数。在这些窑洞里，革命先辈领导了西北革命，部署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从而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正宁县官河镇南500米处有个王录村。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力主讨伐“叛逆”，企图扩大内战，乘机取代蒋介石。为了策应西安事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奉命由三边地区南下，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御敌。行至淳化、耀县、三原时，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部队返回北上。1937年2月22日，红一军团进驻正宁、宁县一带。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孙毅、政治部主任邓小平等领导和军团部，分别住在官河镇王录村、北头村的几孔大窑里长达5个月。其中，邓小平住在王德家的2孔窑洞里。在窑洞中，革命先辈组织红军开展军事训练，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8月上旬，红一军团奉命前往三原整编奔赴抗日前线，这里是红军抗日的出发点。

在正宁县五顷原回族乡南邑村东约500米的半山腰上，有1处窑洞庄院。庄院坐西向东，门前是纵横交错的大沟，不远处是苍葭子午岭，群山环抱，梢林密布。庄院里有5孔窑洞，现为习仲勋旧居。南邑是当时关中特区的首府，习仲勋当年在这几孔窑洞里领导了关中特区，创建了新正、新宁、赤水、淳耀、永红等县的红色政权。今天庄院的墙根底，当年习仲勋种的1棵桑树，苍劲挺拔、枝繁叶茂，一派

兴盛景象。

合水县蒿嘴铺乡张举源村一个小原廓上，有3孔破旧的窑洞，是著名的包家寨会议遗址。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这几孔窑洞里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包家寨会议。会议做出了重建红26军、走井冈山道路，以南梁为中心、建立三路游击区的重大决定。包家寨会议是在全国革命陷入低潮，陕西省委遭敌破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窑洞中做出的决定，挽救了危难时刻的西北革命。毛泽东把这次会议做出的决定称之为“挽救三窟”，也与窑洞有关。

诸如以上有故事的窑洞在庆阳很多，它们见证了我们党早期革命的重大斗争、事变、活动，有着辉煌的历史。陕甘革命根据地时期，党政军的指挥所在窑洞，列宁小学、军械所、被服厂、苏区银行等都在窑洞；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都曾在河连湾窑洞庄院办公，抗大七分校等都建在豹子川的窑洞里。遍布川原、沟梁的窑洞支撑起了战略大后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等都曾在庆阳转战运筹、指点江山，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一步步打败仗、夺天下。

今天，随着脱贫结束，窑洞也成为文物，但属于它的荣耀、沉浸其中的记忆和因尚在，为中国革命立下的功勋彪炳史册、在老区人心中永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褪色。80年前延安的“窑洞对”，也如钟长鸣、永不过时。相信只要不要忘记那些窑洞，历史周期率就不会在现实和将来的中国重演。

(作者系甘肃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研究室主任)